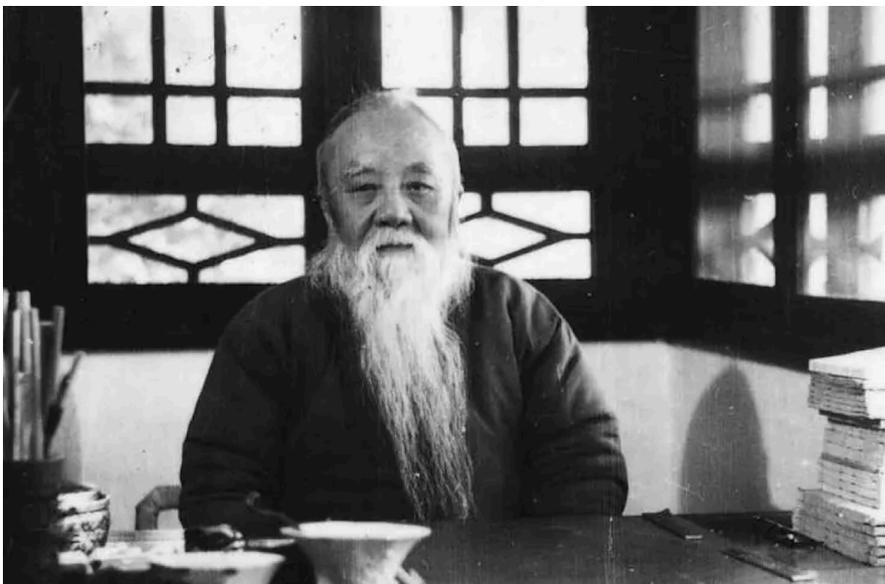


## 能成天下务 岂独一枝安 ——马一浮与国家领导人交往轶事

文 / 吴光 袁新国



### 马一浮

马一浮(1883年4月2日—1967年6月2日),幼名福田,后改名浮,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诗人、书法家、国学大师和书法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现代三圣”(或“新儒家三圣”)。

马一浮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版、英文版的中华第一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浙江大学校歌的词作者,浙江大学教授。古代哲学、文学、佛学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曾应蔡元培邀约赴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马一浮的政治思想纯用经学概念立论,在现代思想界十分独特。他长于疏解传统政治思想的德治内核,展现出道德理想主义色彩。他考察西方政治思想,旨在分判中西优劣,无意进行中西政治理念的深度融通,对中国政治出路的设计具有一定空想性。2023年5月5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马一浮的名字在列。

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创建了新中国,而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人就是马一浮。这样看来,马一浮与中国共产党有着不解之缘。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开国领袖倡导革新、批判旧学、推行唯物主义,而马一浮却相当守旧,他力倡国学、纳西入中、摄于一心,尊奉唯心主义,这又似乎与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思想格格不入。但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介布衣的学者马一浮却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与马一浮之间的交往被传为美谈。马一浮也曾激情赞扬新时代和新领袖,可谓是君子之交和而不同。当然其中也交织着革新与守旧、赏识和敬重,固守中有日新,日新中有固守的情愫纠缠。也许从他们的具体交往事件中,我们更可以感受到这种惺惺相惜的赏识与相互敬重的胸怀。

### 毛泽东礼待马一浮 马一浮敬佩毛泽东

毛泽东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中国新旧交织中成就了旷世奇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之深也世罕其匹。而马一浮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传统文化本位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深与固守,莫之能比。如果他们有所交流,应该不会浅尝辄止,但遗憾的是没有这方面的确切记载。

关于马一浮与毛泽东之间的接触,听闻于马一浮的侄子马镜泉和外甥女丁

敬涵的讲述。据马镜泉回忆，马一浮与毛泽东有过4次接触：1956年全国政协召开知识分子大会，马一浮应邀参加，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亲切接见马一浮等特邀委员，并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这是第一次；1957年，马一浮应邀赴北京开会，在会后宴会上，毛泽东特意与马一浮坐在一起，互相亲切交谈，如同老朋友一般，马一浮后来特意书写“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诗联赠予毛泽东以表答谢；1964年，马一浮应邀赴北京开会，毛泽东特意再次邀请马一浮座谈中国古代诗歌，同时参加的还有熊十力等人，这次马一浮专门为毛泽东写了一副古人名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在丁敬涵的记忆中，马一浮和毛泽东没有多次接触，只有一次在政协会议（1964年）期间接受毛泽东的宴请，与在门口迎接的毛泽东握手寒暄，后被安排坐在毛泽东身旁。对于这次会见，马一浮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丁敬涵看到过两副书赠毛泽东的对联，可能写后觉得不满意，又另外重写了，但由此可见，马一浮对毛泽东是衷心佩服的。其联语，一副是：“旋转乾坤，与民更始；开物成务，示我周行。”落款是“集《易》《诗》《汉书》《宋史》句赠毛泽东”。这是赞扬毛泽东领导人民进行了天翻地覆的革命，扭转乾坤，使人民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成就了百世不朽的伟业，并为大家指出了继续前进的康庄大道。另一副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上款为“毛主席莞正”，下款是“野老马鬣叟赠言”。这副对联，上联用《孟子·尽心》中“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句；下联用《礼记·礼运》中“故圣人耐（“耐”为古“能”字——作者注）以天下为一家”句。上下联均把毛



1957年4月，周恩来总理（左二）陪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期间，专程到杭州蒋庄拜访马一浮先生

泽东比作圣人，而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马一浮，向来就是把圣人看成至高无上的，现在不知道重写后送出去的是哪一副联语，或者另有新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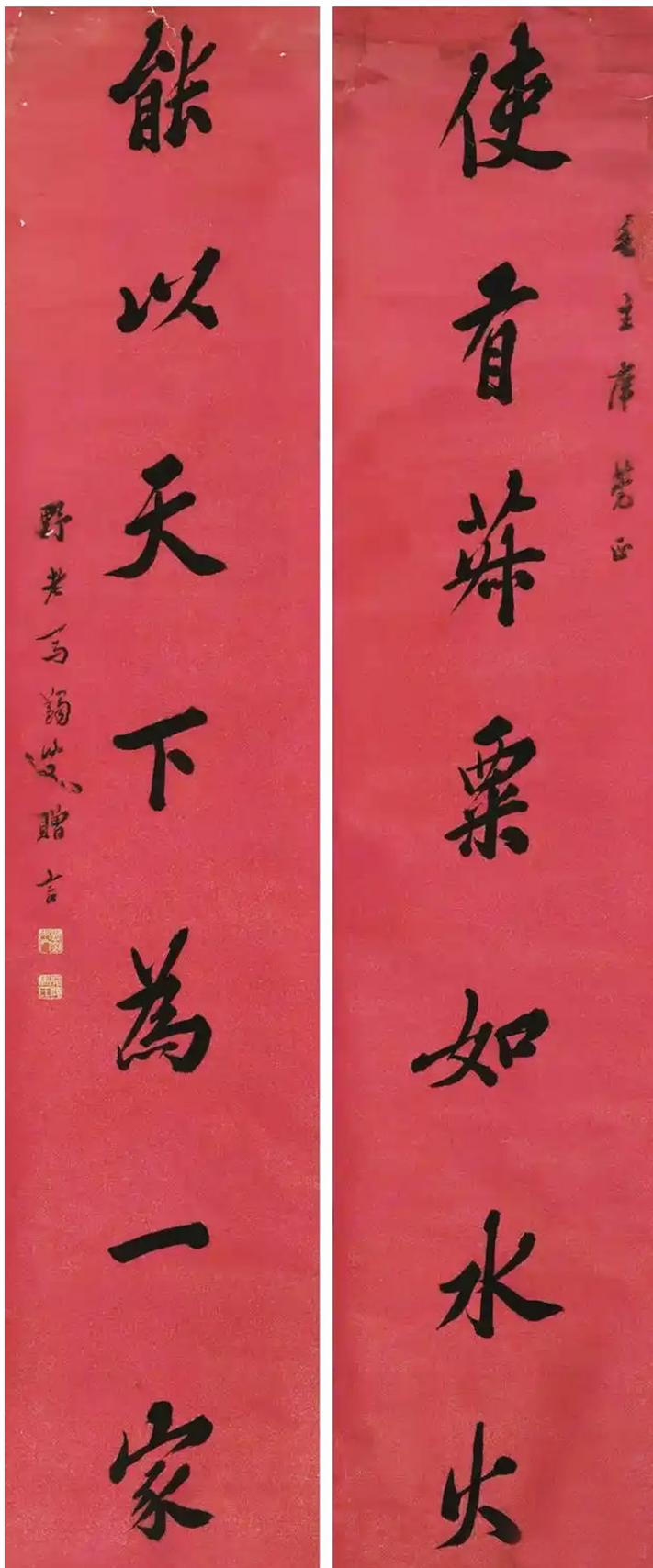
虽然马镜泉与丁敬涵的记忆有所出入，但马一浮与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中相见，毛泽东宴请、礼待马一浮，马一浮敬佩毛泽东的事实是可以确信的。

由于马一浮敬佩毛泽东，曾打破自己几十年不写时贤作品的规矩，破例撰写毛泽东诗词。马一浮给人写字，有一个规矩，就是不写当代人的作品。在他的润例中就有一条：“以时贤作品属题及以时贤文字属书者，概恕不应。”20世纪50年代中期，民间广泛传诵毛泽东

的诗词，有人想获得马一浮手书的毛泽东诗词，便通过马一浮的学生婉转地试问马一浮，马一浮听后没有及时回复，经过几天的考虑，并反复阅读了已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便写了毛泽东词作《沁园春·雪》。就这样，几十年不写时贤作品的老规矩被打破了，这也是马一浮敬佩毛泽东的事例之一。

### 周恩来敬重马一浮 马一浮联赞周恩来

周恩来胸怀坦荡，做事周备，上至国家大事，下至个人关怀，无不劳心挂念、关怀备至，真可谓坦荡大丈夫，他对马一浮这样的大学问家更是非常敬



马一浮赠毛主席书法  
作品内容：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

重。对此，马一浮也深有体会，并大加赞扬。马一浮与周恩来的接触较多，曾被引为一段美谈。

未见其人先闻其名。1949年以前，周恩来与马一浮相识之前，已十分敬佩他的学术造诣及卓越人格。据马镜泉回忆，周恩来是从王子余<sup>①</sup>那里第一次听说马一浮其人的。后当马一浮被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接见，受聘创办“复性书院”时，提出了办书院三条先决条件，其中一条是书院是纯粹学术团体，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周恩来得知此事，称赞他是有骨气的“粹然儒者”。由此，1949年6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政协筹备会上，提出请马一浮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并请当时参加筹备会的民进主席马叙伦负责电告马一浮，但不知是何原因，马一浮未能赴会。

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到杭州参观，借此机会，周恩来与伏罗希洛夫一起亲自登门拜访了马一浮先生。见面后，周恩来郑重地向伏罗希洛夫介绍：“这是我国当代唯一的理学家”。伏罗希洛夫看这位老者长须飘飘，气度不凡，大为赞叹，遂问马一浮在做什么，马一浮回答说：“读书。”再问：“现在做什么？”回答还是“读书”。在庭院前合影时，周恩来请马一浮和伏罗希洛夫站在中间，自己则站在马老先生的身边，并稍微离开一些，以便使后排马一浮的学生能照得清楚一些。这张照片见报后，在杭州引起轰动。总理陪同外国元首登门拜访一位学者，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杭州人民都以此为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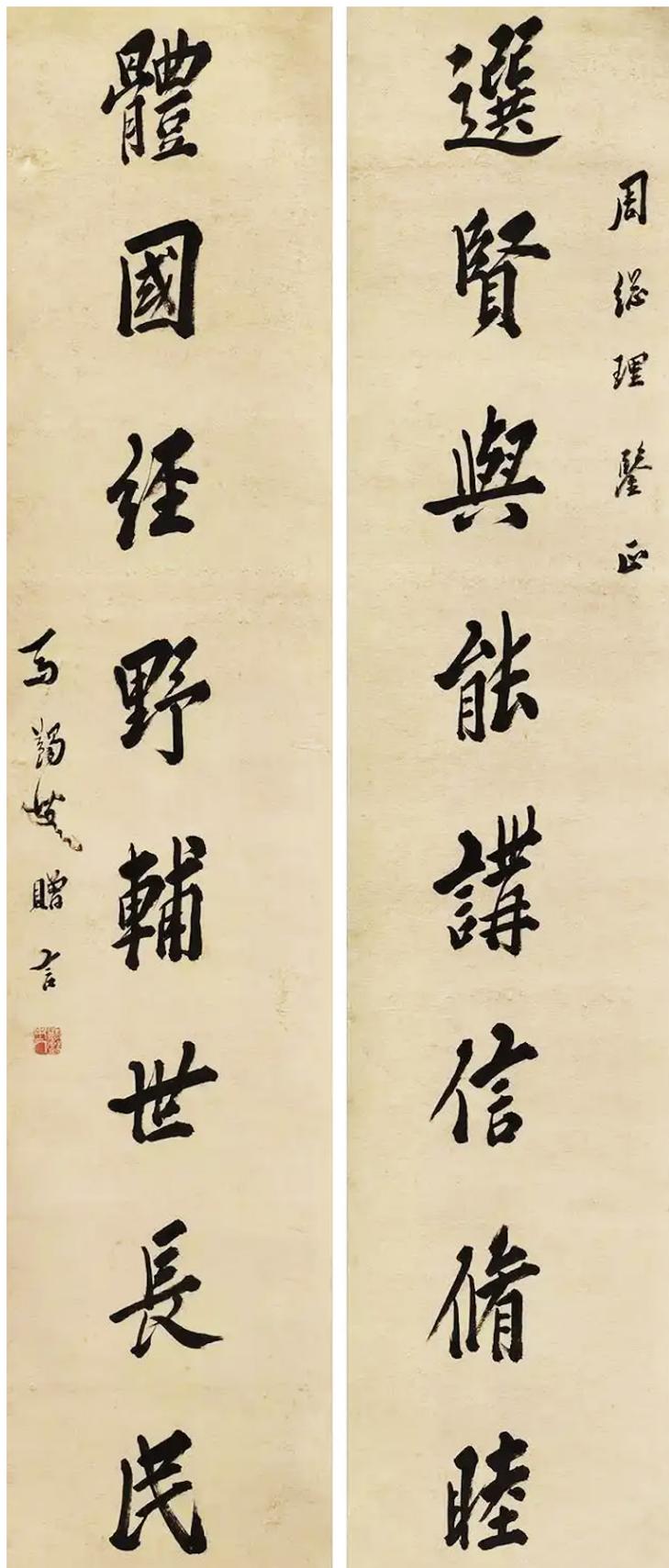
1959年，全国大办工厂，大炼钢铁，杭州半山钢铁厂准备扩建，计划把炼焦车间建在皋亭山西麓。此处有马一

浮的祖坟，还有马一浮的生圻和马一浮撰写的《会稽马氏皋亭山先莹记》隶书大碑。马一浮曾说：“我平生无遗憾，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后要葬在父母坟边。”得知此事，马一浮心急如焚，火速致信厂长，要求保留祖坟。周恩来知道此事后，立即电话指示浙江省领导，要求把这片地方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厂里接到总理的指示，马上修改设计方案，东移炼焦车间，并发动全厂职工在坟、碑周围植树，这样既保护了坟、碑，又美化了环境。马一浮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得到了周恩来的指示，所以特地给厂长写信，感谢钢铁厂的照顾，称这是“仁人之用心”，表示“存歿均感，永铭肺腑，无敢或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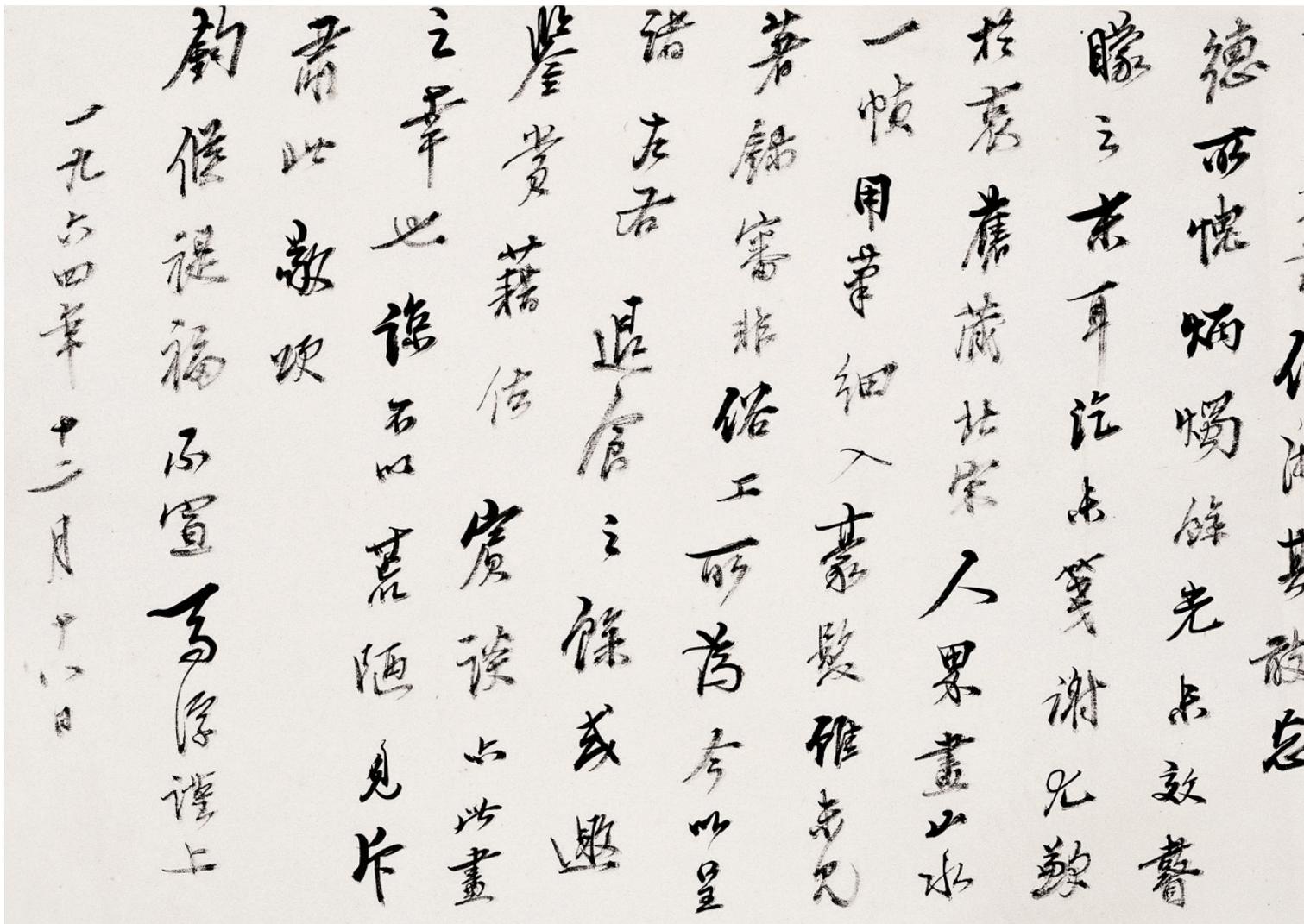
1963年，马一浮生辰之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家财政困难时期，仍指示补贴马一浮先生10000元（当时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840元）用以支持老先生专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文革”期间，周总理担心马一浮会受到冲击，专门打电话给浙江省委叮嘱要照顾和保护好马一浮先生。因此，当红卫兵冲击马老时，他得以很快转移，虽部分书稿手迹被烧，但所幸大部分得以保存。当时，浙江省图书馆接到通知，派人把余下的资料装车拉走予以保存。

周恩来一直敬重马一浮并视之为“国宝”级人物，给予他很多的关怀和照顾，并以中国有这样的人物而感到自豪。周恩来到杭州时，不仅亲自去拜访马一浮，而且邀请马老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如总理陪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来杭参观时，邀请马一浮先生赴宴。宴会期间，周总理再次郑重地向客人介绍：“马一浮老先生是中国当代的理学大师。”

公开赞扬一个人，对马一浮来说是很少的。但周恩来一心为国为民的精神，以及对马一浮的真诚敬重和具体关



马一浮赠周总理书法作品内容：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



1964年，马一浮写给陈毅的信函（马镜泉供图）

信函内容：仲弘副总理阁下：睽教经年，贤劳弥仰。窃惟我国远猷至计，迈越群伦，威懾万方，义动天下，凡属有知，莫不鼓舞。浮虽身在巖藪，诵悦同深。兹届政协集会，再诣国门，瞻望旌旗，曷胜懽懽。未宜过烦吐握，辄以短简略申鄙怀。去冬承政协雅意致问，念其衰病，厚馈药饵，不容固辞。暮齿优游，其敢忘德？所愧炳烛余光，未效瞽蒙之末耳。汔未笺谢，尤歉于衷。旧藏北宋人界画山水一帧，用笔细入豪发，虽未见著录，审非俗工所为。今以呈诸左右，退食之余，或邀鉴赏，藉洽宾谈，亦此画之幸也。谅不以荒陋见斥。肃此，敬颂钧候禔福，不宣。马浮谨上。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怀，深深感动了马一浮。马一浮于 1964 年在古书中集句，写了一副赞扬周恩来的对联送给周总理，联语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上联用了《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语，赞扬周恩来一心为公地选用贤能之人，讲信用，维护全国人民乃至国际间的和睦团结，使儒家大道得以推行。下联分别用了《周礼·天官》中“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

官分职，以为民极”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语。“体国经野”原意是在周代建国之初，区划城乡界线，设定道路、朝廷位置、划分井田等，后来泛指治理国家，和“辅世长民”联系起来，就是说周恩来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是因为他以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来影响、教育人民，治理国家。这联语“古为今用”，贴切地表明了马一浮

的学识，周恩来的操守。

### 陈毅深交马一浮 马一浮出山报知遇

陈毅文武兼备，博学多才，善于写诗，大有风流儒雅之气质，这也许是马一浮与之深交并有共鸣的深层原因吧！国家领导人中，陈毅是与马一浮交往最多、交往最深，也最为相知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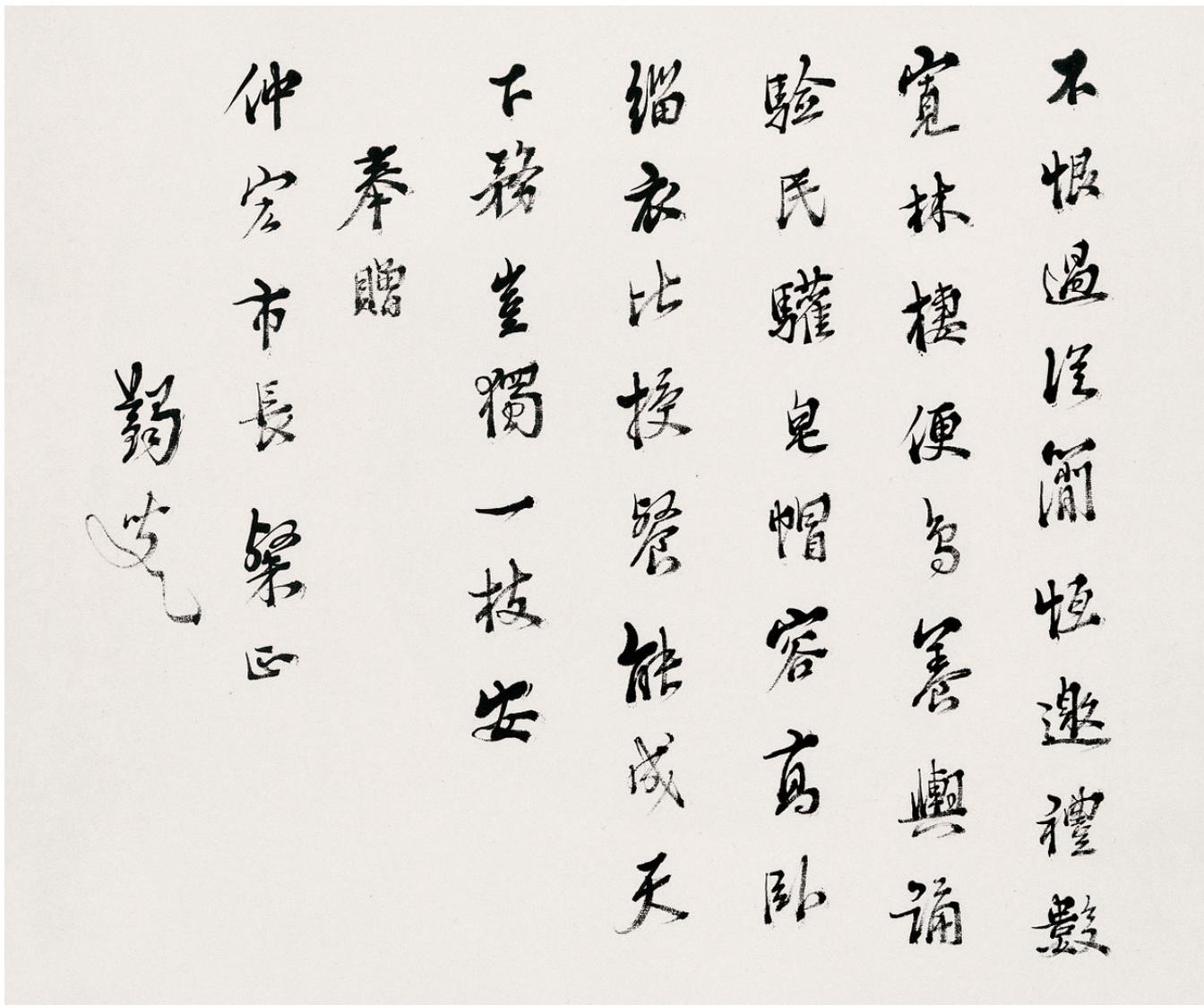
抗日战争前，马一浮长期居于陋巷，闭门读书。抗日军兴，马一浮激于



爱国热情出来讲学，先是应浙江大学之聘，在避寇搬迁途中，讲学于江西泰和、广西宜山，继而入川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除讲学外，还刻印了多种古籍。1949年，书院停办，商借了位于西湖苏堤的私人别墅蒋庄的一部分开设智林图书馆编纂处。不料，1950年2月，浙江省军区某部卫生部队径直入驻该处。在直接交涉无果的情况下，马一浮以复性书院图书馆的名义起草公函，草成后叫人复写了四份，分别寄致上海市

文管会和浙江省有关领导机关。得知此事后，陈毅致信谭震林：“复性书院为东南士子讲说性理之所，亦属文化事业范围。该院主持马一浮先生，为当代名儒，在学术界有相当地位。今该院图书馆房屋为部队住用，恐予人以不良印象，拟请飭令迁址，以示政府保护、协助之至意。”1950年4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聘马一浮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聘书原件由陈毅市长，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具名，现仍存丁敬涵家）。

不久，马一浮收到上海市文管会1950年5月29日直接写给马一浮的“文字第571号”函，称：“关于复性书院图书馆问题，已经由陈市长致函谭主委，请飭迁让。兹将原函抄奉。”卫生部队很快就迁出了，马一浮移居蒋庄复性书院图书馆编纂处（后称“智林图书馆”）也得以继续开展工作。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马一浮被“红卫兵”扫地出庄之日，马一浮一直居住在蒋庄，从事编纂工作，吟诗作字。



1953年，马一浮作《赠陈仲弘》诗一首赠陈毅

作品内容：不恨过从简，恒邀礼数宽。林栖便鸟养，与诵验民驩。皂帽容高卧，缁衣比授餐。能成天下务，岂独一枝安？奉赠仲宏市长梁正 蜀叟

陈毅致谭震林的信，以及随之聘请马一浮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之事，表明陈毅从党的政策对文化事业的关心支持，对复性书院及马一浮个人的了解和尊重，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第二年（1951年）春天，陈毅特意登门拜访了马一浮。

当时，浙江省文教厅厅长刘丹陪同陈毅去蒋庄拜访马一浮，登门时马一浮还在午休，陈毅不让马一浮的家人通报打扰，就去了湖边垂钓等待。谁知天

公不作美，下起了霏霏春雨，等到马一浮午休毕再去登门拜访时，陈毅的衣服已被雨水淋湿了一半，有人比之为“程门立雪”。这次会面，两人相谈甚欢，为友谊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对马一浮来讲，这次会面也是印象最深的一次。1956年元月至京参加政协时，马老特意作《北游赠陈仲弘》赠与陈毅，末联为：“西湖应在念，垂钓兴悠哉。”小注云：“君昔年曾过湖上垂钓，见之篇咏。”

此后，两人又多次在上海、北京、

广州会面，并互赠诗文，特别是马一浮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期间，陈毅是座上常客。期间，陈毅对马一浮关怀有加，多次邀请他进行身体疗养，并安排避暑。自1959年开始至1965年“文革”前一年，马一浮每年均被安排至莫干山、庐山、金华北山等地过夏避暑。

马一浮与陈毅达到了精神境界的交流 and 共鸣。1956年，马一浮赠诗称陈毅“谈笑安诸夏，经纶识异才”，表达了对陈毅雄才大略的佩服。1963年的《赠陈仲弘》则更加全面地歌颂了陈毅参与

谋划国家大计方针的制定及在内政、外交方面的贡献；表达了自己和人民群众对国泰民安的喜悦之心、对陈毅的敬佩之情。他写道：“讷谏定国特贤才，旷代经纶式九垓。要使斯民安衽席，有时谈笑挟风雷。鸣鸾佩玉遯方至，鼓瑟吹笙阆苑开。我亦讴歌偕野老，杖藜翘首望春台。”马一浮还认为与陈毅交谈，在他的精神影响下“足慰衰残”，可以“一振衰暮之气”。陈毅亦视与马一浮的交谈能摄心、养性，使自己气清、神明，能很好地修养身心，并常读马老诗以调养身心。1959年，马一浮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陈毅因病未能与马一浮畅谈，乃写信给马一浮：

“浮老尊鉴：先生此次来京，我因病未能聆教，深以为怅。病中时展诵先生题褙帖诗和先生前后寄我诗作，佩服！佩服！尊作不仅典雅且有醇味，弟最爱读，希时以新作惠我……”

马一浮感染于陈毅为国为民的心怀和对己真情厚谊的关怀，以及相知相识的情怀，改变了自己不仕新朝的初衷，从此愿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1950年，马一浮应邀出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53年出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直至1966年“文革”开始），1954年后为第一、三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于1963年11月去京参加政协会议时，带去历年书法作品354件（册）交给陈毅，附信称：“窃惟国家文教设施有取于艺术，书法虽末，亦在艺术之科，某少好金石，粗知碑帖源流，笔势利病，但学之未精。年逾耆艾，始少有进。60以后临摹所积，尚百余册，众体略备；自余杂书屏连手卷等亦二百数十件，俱未装池……谨别具草目，悉数捐载以进。如何措置，悉听平章。”后来，根据陈毅的意见，所有作品全部捐赠给了全国政协。当时还



马一浮先生像，1953年摄于杭州活佛照相馆（图片来自陈星《隐士儒宗》）

在政协礼堂专门举办了“马一浮书法展”，并拍摄了新闻纪录片。“文革”后，全国政协将作品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仍收藏在馆。

不恨过从简，恒邀礼数宽。  
林栖便鸟养，舆诵验民欢。  
皂帽容高卧，缁衣比授餐。  
能成天下务，岂独一枝安？<sup>①</sup>

马一浮在《赠陈仲弘》这首诗中，表达了深受国家领导人礼贤下士的感染，不愿再置身于万民欢乐鼓舞的新时代之外，发出了“能成天下务，岂独一枝安？”的心声，并身体力行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

的贡献。

#### 注释：

①王子余（1874—1944年），名世裕，浙江绍兴人。父庸吾，与周恩来祖父周殿魁为儿女亲家。王子余与马一浮世属乡谊，因而受到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托，出门邀请马一浮来浙大讲学。后出资刻印马一浮讲稿，成《泰和会语》传世。

②诗载《马一浮集》第三册556页。

（作者分别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 一代儒宗马一浮

文 / 高志林



1904年，马一浮（右一）与谢无量等在日本合影（丁敬涵供图）

小桥流水楚楚有致，绿林深处隐隐见屋。来到水乡泽国——浙江绍兴腹地的上虞长塘镇，映入眼帘的尽是一层叠一层的翠竹。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我国一代儒宗马一浮的故居就坐落在这竹林深处一个名叫后庄村的地方。

马一浮的故居是一间极为平常的老式旧楼房，楼后附设一间极矮极小的平屋，中间隔出一个四方的小天井。马一浮就是在这样一高一矮的粗舍中度过了他的少年和青年岁月。

### 学宫院试名列榜首

马一浮（1883—1967年）名浮，字一浮，号湛翁，晚年自署蠲叟或蠲戏老人。他出生在四川仁寿县，逝世于杭州西湖。

马一浮6岁随父母返回上虞后庄。幼受母教，是一位远近百里所公认的“神童”。他8岁就能读《楚辞》和《昭明文选》；9岁时，母亲何氏指着天井里盛开的菊花，命赋五律一首，并限麻字韵。马一浮应声而就：“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处士家。晨夕秋更洁，不必羨胡麻。”母亲见儿子如此聪慧，十分欢喜，说他长大了必能成才。但又觉得幼年出句竟似不食人间烟火，恐怕“一生少福泽耳”。不幸第二年母亲果真病故。从此，小一浮寂寞一人，终日与书作伴。不管什么书，只要是书，他就会昼夜不分地去读。因此，儒学、佛学、文学、哲学……无所不涉。后来，父亲怕他私读一通会误入歧途，便延聘了一位绍兴颇有名气的举人郑墨田来家教书，但没多久，郑举人便辞馆了。父亲始以为是浮儿不听管教，后方知其才学确实已超过郑举人，于是无奈，只得亲自试教，但亦自感弗如。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戊戌年（1898年），16岁的马一浮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同应绍兴府学宫院试，同中秀才，马一浮更是名列榜首，连主考官汤寿潜（民国浙江都督）老先生都爱其奇才，挽人执柯，将爱女嫁与他为妻。

在马一浮与汤氏成婚的第二年，因父亲染病，他毅然离乡入川去侍候病父。翌年，父病逝，他守制三年。时妻有孕，他决意使之堕胎，不幸妻亡。从此，马一浮只身来到杭州，开始了他潜心国学和研

究西方学说的“万里之行”。

### 崇尚中道并包西学

马一浮独身来到杭州后，深知是书把中华悠远历史连成缆索，使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使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然而他又明白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所藏之书又何以保证不流散呢？“君王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几张脆薄的纸页？因此他寄居在圣因寺，以目不观园，足不出户，点香记时之法，潜心学问。其间，常有亲朋好友来访，向他提亲，也有劝他领养一个儿子的，但马一浮心中只有汤氏淑姊，哪肯再娶或收领他人之子。于是在年未30就蓄须明志，一心向学，尽读强记文澜阁《四库全书》36000余卷。马一浮虽以中学为基础，崇尚中道，但也并包西学，不排斥西方文明。在1902年，与汤蛰先（汤寿潜）的弟子谢无量一同赴上海自学英文、法文。后来又结识广西的马君武。为从学术上唤醒民族，振兴中华，三人共创《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翻译介绍斯宾塞等西方文学、哲学。1903年，中国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的第12届世界博览会。清政府任命溥仪亲王为团长，筹备有关事项。马一浮因精通英语等多种语言，特被筹备组招为雇员，分工负责具体筹办世博会中国展馆和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他6月启程赴美，于7月3日到达圣路易斯。他本以为中国的参馆

人员在那里可与世界各国朋友通畅交流，哪里知道美国对中国人十分苛刻。他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美人定华商赴会例，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其他尚未知如何。盖彼固以绝对之野蛮国待我，皆我之败种，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以失国际上之位置，比于亡国。彼曹犹昧昧不觉，得西人之一顾一笑，且以为莫大之荣幸也，岂不哀哉！”为此，马一浮一边据理抗争，一边偷偷遍跑圣路易斯的所有书店。就这样，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阅读了亚里斯多德、斯宾塞、黑格尔、赫胥黎、达尔文、孔德、但丁、拜伦、莎士比亚等古哲文豪的大量哲学、文学名著，还翻译了《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史》《法国革命史》和编纂《欧洲文学四史》《诗人传》等著作。同时还参观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后又转道去了柏林学习德文，在那里，他读到并买下了一部德文版《资本论》。由于马一浮“抗命不遵”，美方终于在1904年4月29日，即圣路易斯博览会开幕的前一天，勒令他返回。5月6日，马一浮含恨离开了美国。归国途中，他悲愤地作诗书志，中有“沧海飘零国恨多”“国命真如秋后草”等句。

1905年，他来到了日本，当时日本友人们争相传阅他携带来的《资本论》。在日本，他又学习了日文与西班牙文。其间，他翻译过日本松平康国的《政治罪恶论》，并在译完后于原书封底写了“译成圆满，自由万岁”几个字。年底，他带着《资本论》回国。接着，他手译了《资本论》的若干章节，并与好友何夔侯一道探讨过它。随即他将这本自认为是经典的好书送给了光复会会员



1942年4月，马一浮六十寿辰时，复兴书院同仁及弟子齐聚濠上为其祝贺并合影留念（丁敬涵供图）

刘师培办的扶轮社，期望得以传播。但后来刘投靠了袁世凯。袁世凯死后，扶轮社被抄，《资本论》流入旧书摊，后被马君武发现，买回来“完璧归赵”。到了抗日时期，马一浮应竺可桢校长之聘到浙江大学讲学，便将此书送给了浙大图书馆。结果，还是日本人先一步把《资本论》译成日文出版，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等先后从日本读到《资本论》，可谓移樽就教。这是马一浮为之深感遗憾的事。随后，他又从英译本移译西班牙名著《唐·吉河德》，并陆续发表在上海《独立周报》上。马一浮是个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又回到中国传统文化来的学人，也是一个努力将西方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谋求中华富强的爱国者。因此，他很受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敬重。蒋介石还专门宴请过马一浮，并在席上虚心讨教治国之道。同时，他又为毛泽东、周恩来与陈毅所器重。其中最为后人传诵的是陈毅“马门立雨”事：1951年4月的一天，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专程到杭州郭家码头马一浮家拜访。当时马一浮正在午

休，家人想唤醒他，却被陈毅阻止。陈毅一边垂钓一边等候马一浮醒来，不料过一会天下起毛毛雨来，马一浮醒来赶忙请进时，只见陈毅等人衣帽鞋袜皆湿了。马一浮被陈毅这种礼贤下士的举动所感动，愉快地接受了公职，被聘为华东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53年，他又受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长。1954年以后，马一浮历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但他很少外出参加政治活动。

1956年，全国政协召开知识分子大会，马一浮应邀参加。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又单独与马一浮等一起合影留念。1957年，已75岁高龄的马一浮又应邀赴北京开会。毛泽东在宴请大家时，特意与马一浮坐在一起，嘘寒问暖，亲切交谈。宴会之后，马一浮书“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联诗赠予毛泽东。1964年，毛泽东又特邀马一浮去聚谈中国诗歌。在聚谈中，马一浮举笔为毛泽东写下“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楹联一



20世纪50年代，马一浮在杭州虎跑“滴翠崖”摩崖题字与弟子丰子恺（左一）等人合影

副。周恩来对马一浮的学识人品一向十分赏识。他在1957年陪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时，特地同到西湖蒋庄拜访马一浮，并合影庭前；其后，周恩来陪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杭州，又特邀马一浮陪宴。席上，周恩来还向客人介绍说：“马一浮老先生是当代‘中国唯一的理学家’。”马一浮虽受此殊遇，却从不向外人夸耀过点滴。

### 红粉知己终生不娶

正当马一浮潜心学问时，汤家三女琳芝，在不知不觉中闯进了他的生活，成了马一浮的红粉知己。她见姐夫孑然一身，孤寂悲伤，便时时以诗词代言，以诉自己的衷肠，去抚慰马一浮的心灵创伤，马一浮也每每以诗词酬答，或感激琳芝的体贴，或抒发胸中郁结。如此日子一长，双双坠入情网。马一浮囿于父孝在身和丧妻之悲，不便直言婚姻事，但又总借诗词寄托山盟海誓和白首之约。而汤家三小姐，更是动了情恋之心。

当马一浮守满三年父孝和三年丧妻之哀后，准备正式向汤琳芝提出结婚事时，万万没有想到，汤琳芝回答他的，竟是一首婉转的拒婚诗。原来，汤琳芝患了当时被视作不治之症的肺结核病，而且已到了晚期。为了不想耽误自己心上人的终身大事，汤琳芝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桩婚事。当马一浮弄清原委后，向琳芝表示：“从现在起，我要潜心学医，一定要亲手调治好你的病，不达目的，我就终生不娶。”

在岳父汤寿潜和汤琳芝的疾患困扰下，马一浮不得不暂停佛教典籍的研究，广交名医，钻研医学。虽为业余，但其造诣获得了当时及后来的一些名医如王逸达（慈禧太后曾用挂彩专列请他进京为她治病。1932年，他又被专机接往西安替蒋介石看病）等人的敬重。这不仅有他身后整箱整箱的中西医书可证，也有他早年给岳父汤寿潜的书信为佐。他在1916年5月7日致汤寿潜的信中说：“丈人患脾泄有年……闻近亦

略患足肿……《内经》有云：土不及曰卑泄，体肥硕者恒多，湿已困而思虑复伤之，又为肝所乘，弱而失运，故常泄……婿略涉医经……伏愿体圣人慎疾之道，量进药饵，治于未然，使形神安和，疾疢不侵。”马一浮在废寝忘食地为琳芝寻觅回春良方的同时，还亲手处方，亲自抓药，亲尝并亲喂汤药。在马一浮的精心呵护下，汤琳芝的病确曾一度出现过转机。孰料不久病情反复，汤琳芝含着眼泪恋恋不舍地抛下了马一浮，溘然西归。马一浮五内俱裂，欲哭无泪，面对汤氏两姐妹的亡灵，沉痛发誓：从此终生不娶！

### 收录弟子佳话传世

马一浮周游列国回来时，正值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他深深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后袁世凯复辟称帝，军阀混战，他目击国事，既不愜于居高位者之所为，又自度力不足以拨乱匡俗，发愤杜门，治学益勤，从不虚掷一时。先是潜心研究佛学，又精研老庄，以一目十行，过眼即烂熟心内的智慧，博综百家，返而钻研六经，著有《法数钩玄》《老子道德经》《庄子笺》等书。曾获时人“天下文章归马氏”之誉。

马一浮是一位天分极高、学识渊博的人。他精通外文典籍，襟怀开放，不抱残守缺，能取精用宏，不步前人，自辟康庄；他励精图治，治学极勤，中西兼容，古今并包。这就常使接近他的人为之倾倒、震惊。丰子恺生前把他比为颜子（见丰子恺1933年《陋巷》一文），后来又把他比孔子，说：“与马先生谈话，如同呼吸了一次新鲜空气，可以持续数天的清醒与健康……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的或出世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原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

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能背诵出原文来。”弘一大师李叔同亦惊叹：“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人。”因此，慕名前来拜马一浮为师者甚多。有的挽人托眷，有的甚至恸哭失声、长跪不起。马一浮虽深知他们都是笃诚而来，但仍不放过考察对方的学识、人品、气质与操守。据说，浙江诸暨县有位年高德劭的寿老先生，他在病危时，致书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儿子，叫他以学业为重，不必回来奔丧，嘱他学成归国，务必拜马一浮为师。其子寿毅成学成归国后，便当即挽人求拜马一浮为师。马一浮再三逊谢。寿毅成诉说自己连父亲死都未能回来奔丧，如今不能实现老父遗命，有何脸目以对九泉之下的先人？竟恸哭长跪而不起，马一浮深感其诚，只得答允。这仅是马一浮收录弟子中的一段佳话。

### 鬻字刻书独撑书院

1938年，蒋介石听说久隐西湖的马一浮应竺可桢的两次登门相邀，到流亡中的浙江大学讲学，便立即与孔祥熙、陈布雷等商议，发起并指令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聘请马一浮出山弘扬民族文化、在四川创办复性书院。马一浮于1939年8月来到四川嘉定乌龙山下，亲自动手盖起“濠上草堂”。起初，复性书院借乌龙山乌龙寺招生开学，马一浮居住在乌龙寺的尔雅台。相传，这尔雅台原是晋郭璞注《尔雅》的地方。这里因游人不到而得全，干佛云，望之如盖。马一浮十分欣慰便叹息曰：“无材，其为众所弃者，乃其幸也。”为明不用之为贵，即兴作《乌龙楠树歌》自明心迹。但总因乌龙寺场地狭小，不久便移址乌龙山下，马一浮亲自动手筑茅屋五间。虽屋宇不够畅亮，但周围的竹风随地畅，门前的曲水欢快流，再加上屋后的青松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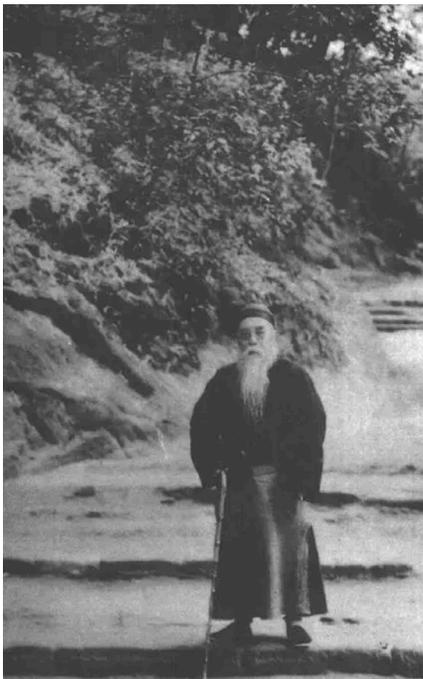


1984年，与熊十力（前排右三）、叶左文（前排左三）摄于东迁后的杭州葛荫山庄复性书院（图片来自陈星《隐士儒宗》）

时飘香，马一浮深爱之，便取名为“濠上草堂”。乃典出《庄子》“秋水篇”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的故事。马一浮又亲拟并提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四条学规。故此，书院创立不多时，就蜚声海内，慕名求学者竟多达800余人。一时间，乌龙山下，书声琅琅，弦歌四起。

复性书院初创时，马一浮特聘谢无量主讲玄学，熊十力主讲义学。但后来谢无量谦辞不就，熊十力开讲两月因故中途离去，结果只剩下马一浮一人支撑。马一浮专讲六经大义，指出：“国之根本，系于人心，人心之存亡，系于义理之明晦，义理之明晦，系于学术之盛衰，中土圣贤道要尽在六经，唯六经可统摄一切学术，一切学术莫能外之。”“故必确立六经为本，而后中土学术之统类可得而明，文化之源流可得而数，即近世异域新知亦可范围。”

六艺（经）可以统摄一切学术，并不是说可以不学其他，废弃其他，而是指六艺乃义理总汇，是客观存在的、人心所固有的。为此，马一浮又主张“归求诸己”，说“读书须先理会文义，下涵养功夫，始可望有进”，“读书须是处处反到自己身上来，不反求诸己而求诸外，纵有所知亦非真知”。“六经亦非圣人杜撰出来，而是人人自心所具之理……执言语、泥文字者每以典册为经，不知宇宙间本来有这些道理”。认为“理不在远而在自心”，读经只是帮你了解自心本具之理。所以读经务必“穷理尽性，验之身心，见诸躬行”，一生言行皆以义理为准绳，莫不合乎六艺之教。为便学生易懂，马一浮又把《六经》分成三类：一类为诗、乐：辞赋文笔皆统于诗，声律音韵皆统于乐，故文学、艺术、美学、文字、语言诸学皆属于此；二类为书、礼：一切政事皆统于书，一切制度皆统于礼，因而政



1941年，马一浮先生摄于乌尤山（“青衣别岛”）（图片来自陈星《隐士儒宗》）

治、法律、经济诸学并属于此；三类为易、春秋：易以天道下济人事，春秋以人事反之天道，今凡欲研求自然界之法则，欲明宇宙之本体者，不能外于易，凡言人群之事，相究正变得失者，不能外于春秋，故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天文、数理等自然科学并属于此。并强调说，六经大义，不分今古、不分汉宋、尊信程（颐）、朱（熹），而不薄陆（九渊）、王（阳明）；推崇儒学，而又不避佛法，大义微言，融会贯通，然各有分限。为此，马一浮在书院《简章》中就明确规定：“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书院以综贯经术讲明义理为教……”“书院确立六艺之教，昌明圣学，始于读书究理，反身修德，终于穷神知化，践形尽性”。

为了贯彻这一教学宗旨，使学生有进德入道门径，马一浮在每次开讲前，都要穿好袍褂礼服，案上必放鲜花一瓶，讲堂气氛肃穆安详。有学生曾问他

师法何人。他回答：“直接孔孟。”

马一浮文章讲稿，根据义理，无施不可；他的演讲，言必雅训，辞必典出，出入周、秦，驰骋汉、唐，而又从不剽窃他人一言一语，格调谨严、气势浑厚，听之多有感动落泪者。

但好景不长，事与愿违。原先国府同意拨款创办复性书院的经费迟迟不能到位。为此，马一浮只得去重庆催讨教育经费。然教育部借故要书院呈报讲学人员的履历和教材以备审核。对此，马一浮认为这是教育部对他的一种侮辱，便责问教育部违反诺言，并当众宣示辞去讲席，专事刻书。就此，教育部停发了一切经费。马一浮被迫写出《鬻戏斋鬻字刻书启》公开声明将以鬻字所得充当刻书之经费。

马一浮鬻字刻书的情况，在《大学纂疏》中有记载：

此书共六万三千四百三十八字，共计国币五万二千一百九十七元。在马湛翁先生鬻字移润捐款下动支二万元，又沈敬仲先生一月至六月逐月移捐食米一市石计国币二万二千七百八十元……

沈敬仲当时担任书院院长，每月薪金为一市石大米。以米价论，马一浮所捐出的二万元国币还不足以购买六石大米，可见鬻字刻书的艰辛程度。马一浮在万般无奈之中，又被迫改写出《鬻戏斋鬻字改例启》，再次声明今后“不复更言刻书”，也不再受书院一粟一币，坚持以“易粥”，将卖字所得之钱维持全家五口（当时马一浮的家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外甥丁安期君一家四口组成的）的生活所用。

马一浮的书法，凝练高雅，不名一体。篆书，直接取法李斯。隶八分，直接取法汉碑。真行书植根于钟王诸帖，兼用唐贤骨法。他提倡尚古而不泥古，书法要写出自己的风格。即所谓“书如

其人”“书为心画”，达到神悟，方能入雅。马一浮还精于篆刻，知者不多。他取法秦汉，锲而不舍，功力至深。其章法刀法，浑朴劲健，韵味隽厚，实非常人所能企及。因此，当时海内外学术界对其寸缣尺素深加宝贵，各博物馆、图书馆亦争欲征求入藏。但马一浮并不是见人便卖的，世间之人也并非出几个钱就随便可以买到其字。马一浮对于“鬻字润例”是有对象选择的，一定要有熟人介绍，弄清来历，才可以钱换得数字。当时上海有位李姓巨商，为纪念他母亲，不惜重金遍求海内名家属笔题褒。因马一浮不随便卖艺，独付缺如。后来探知马多交僧侣，乃请一老僧陪谒马一浮，下跪叩头，求撰墓志。马一浮为之感动，允其所请。他日撰就，手自端写与之。对李说：“我不要当世名家写我文章。”李不费一文钱，竟得到马一浮连撰连书，大喜过望。

### 风骨傲岸绝意仕进

民国初期，蔡元培任首届教育总长，特聘马一浮出任秘书长。但他到任不满三周，便就深恶官场勾心斗角，自叹：“我这人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仍回西湖去读书吧！”就这样，他辞去了秘书长之职，从此栖身陋巷，一心治学，以布衣终其身。但由于马一浮的声名日著，海内学者仰慕其高风，前来结交问道者日众。计有梁漱溟、马叙伦、陈独秀、沈尹默、汤用彤、朱光潜、周孝怀、金香严、洪巢林、叶左文、曹子起、陈樱宁、林同庄、熊十力、钟钟山、邵秋、程演生、苏曼殊、李叔同、夏巧尊、夏承焘、严群、丰子恺、龙榆生等。当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为提高北大的知名度，又执意要请他去文科任教，然马一浮还是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坚辞了。后来，孙传

芳驻扎杭州，慕名前去专访马一浮，而马一浮明确表示人在家就是不愿见，表现了威武不屈的气节。

其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时，蒋介石又召见马一浮，并一再好言挽留他辅佐国事，但马一浮绝意仕进，还是婉言谢绝。

马一浮不但自己绝意仕进，而且要求自己的学生不求仕宦而求学。这在他为《复性书院简章》事曾与熊十力的商议信件中有明确记录。他这样写着：

“学生若为出路来，则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乃与一般学校无别，仍是利禄之途，何必有此书院。”复性书院虽只开讲了两年多的课，但确实造就了一些人才。当时书院的学生，后来不少都不进仕度，而多执教于大学，在继绝学、文教化方面做出了贡献。

还有一事值得在这里写上几笔。那是袁世凯窃取国民政府大总统时，马一浮的岳丈人汤寿潜任沪杭铁路总理，其间汤氏不取分文薪金。后来，袁世凯派人送去20万大洋以作酬劳。汤寿潜避而拒收，代其接待来使的马一浮却以不收则将又被用作涂炭生灵为由收下，悉数捐给了浙江教育基金会，浙江教育基金会后来用这笔钱和利息，在场官营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浙江图书馆造福乡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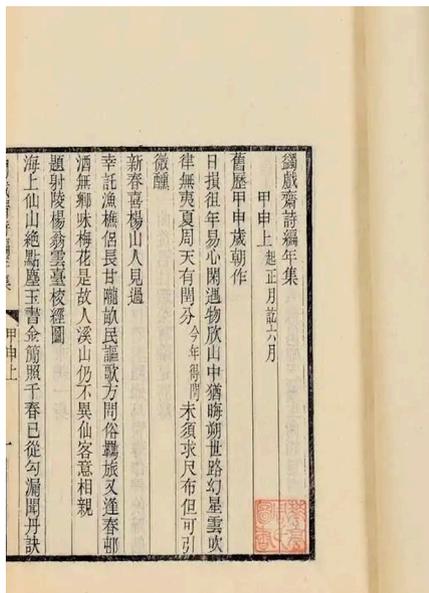
### 理语入诗以诗说法

马一浮的诗上规葩经、楚骚，历建安、六朝，以迄唐宋各大家，无不穷其源流，汲其精深，理事双融，境智俱足，尤以五言见长。诗中喜用玄言，自出抒轴融入句中，使人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感觉。沈曾植论诗，以“开元”“元和”“元佑”为“三元”，马一浮增以“元嘉”创“四元”之说，提示后学者以学诗关键。马一浮在论诗时着重指出：“诗，第一要胸襟

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细，第四要神韵高。四者具备，乃足名诗。”马一浮作诗，尤其是60岁以后所作的诗词，无论古体律绝、长篇短句，均从性德中自然流出。

现代的不少诗评家都一致肯定马一浮的诗“不苟作，言必有义，写景状物，皆言志说法。咏古讽今、扬善抑恶，存美刺、正得失，深得诗三百思无邪之旨”。抗战期间，马一浮应竺可桢之邀以大师名义在浙江大学讲学，并随浙大内迁后，就因“老而播越，亲见乱离，无遣身之智，有同民之患”（马一浮《蠲戏斋诗·自序》）而写了《避寇集》等大量诗作。谢无量在为《避寇集》作序中言称“得诗人之正者”，又说“盖无高世之度则襟怀不旷，无出之智则理致不莹，无专精之才则词气不纯。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君子安身于不易之处而后出言皆得其中，充实于内者则光辉于外也”。

历代诗人都感到作诗以说理为最难。而“以理语入诗，以诗说法”正是马一浮诗的最大特点，他所作的各体诗中无不入于理语。在写歌行体《赠丰子恺》后，他对学生说：“歌行非理事双融、境智具足，未易下笔。此诗气格声韵均恰到好处。贤辈于诗用力未深，观此却可以资助发也。”《瘞猫》第二绝全用公案，亦是自然流出，并非作意安排。马一浮的诗，能做到“入理则一，面目各异”，而且无一字无来历。圣贤之教、佛祖之言、道家之典、诸子之论，以及古诗词曲、灯录公案，莫不在诗中运用自如，天衣无缝。以佛经对六经，以《法华》对《庄子》，信手拈来，都成妙谛。以古人诗词互对，典雅自然，莫不寄托着他自己的真情实意。状物写境，深得比兴之旨。引禅入诗，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以玄言说



《蠲戏斋诗编年集》

理，理、情、境交融，浑然一体。以诗说法，言在此而意在彼，存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马一浮之诗，正如梅尧臣论诗所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古诗中理境最高者为渊明、灵运、摩诘、少陵，俱以气韵胜。宋诗说理，过于质朴，缺少神韵，有时造语生硬，音节亦多有不逮。马一浮以理语入诗，以诗说法，可以上追陶、谢、王、杜。请读先生在弥留之际（1967年，马一浮病剧，时值“文化大革命”的乱局）的一首《拟告别诸友》的五言诗就不难读出他的精神境界。诗曰：

乘化吾安适，  
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  
视听总希夷。  
泯灭全归海，  
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  
落日下崦嵫。

### 由佛入儒一代宗师

马一浮对佛学的造诣极深，三藏



1942年前后，在四川乐山濠上草堂书房

十二部无不熟读强记，人称“佛学大师”。他自20世纪30年代初就广交方外之友，杭州虎跑定慧禅寺的《五百应真造像石刻后记》，便是他1925年所撰。那时在浙江一师执教的夏丐尊、李叔同和学生丰子恺，都是马家的常客，是常常去向马一浮讨教佛学经典的“学生”。后来，李叔同终于在虎跑出家，也是赖马一浮的接引，才悟道出家的，据说还是马亲自送他至虎跑去披的。夏丐尊、丰子恺虽没有出家，但受马一浮的佛学影响却是很深的。

1937年3月19日，夏承焘教授携印西法师同去马一浮家请教佛学。他在日记中这样写着：“早与印西（和尚）同过马所巷十三号访一浮先生，问读佛典，彼谈甚有兴，谓入世出世非二事……古今为学异同，只务内务外二事，又谓佛经为词赋体，故多排场。

学佛先看《大乘起信论》，禅宗先看《六祖坛经》《五灯会元》。十一时辞出。”足见马一浮对佛学研究的博雅。

马一浮是现代儒家的代表人物。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启始期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西学以谋求国家富强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马一浮儒学思想的形成，是承接宋代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的。这在之江大学教授夏承焘于1931年5月10日的一篇日记中便可证实。

“早八时往延定巷三十二号访马一浮先生，值其早饭，少待出见……九时余辞出。马翁所居甚简陋，而两客厅陈几椅数十，知宾客甚盛。壁间满糊碑帖，有自书一联，署名蠲叟，联曰：‘任呼茂叔穷禅客，早判公羊卖饼家。’上联意谓：任从大家称呼周茂叔为穷究禅理的

学者。下联意谓：早就判定，我只是卖糕饼的店家而已。”马一浮主张以六艺来统摄一切的精神与文化，而六艺之总在于“论语”“孝经”。发明了见于这两者的义理，也就等于掌握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以他提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这四条学规，并将理、心合一，强调“心外无理”的观点，以调和程朱陆王之别。

诗言志、文会友，马一浮宗师诗文遍四洲。其一生重要的著作有《尔雅台答问》《诗教绪论》《论语大义》《礼教绪论》《洪范约义》《孝经大义》《老子经》《希言（附易义）》《鬻戏斋诗编年集》、《苏林词胜》和复性书院讲录等几十种著作。

1967年6月2日，马一浮离开人世。他生前曾多次嘱托亲友：“我平生无遗憾，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后要葬在父母身边。”马氏的祖坟位于绍兴上虞东关，1923年，东关因水灾其祖坟棺木进水，马一浮日夜不宁，苦于无钱，不得已走出书斋，生平第一次向社会名流卖字。以润笔所得，在杭州皋亭山（半山）购得十余亩山地，将其祖母、父母等6具棺木迁移安葬。1947年，他闭门伏案数日，撰写了1000余字的《会稽马氏皋亭山先莹记》碑文。马一浮还在先莹之侧预制好自己的生圻，但终因“文革”之灾，他的亲友们不得已将他的骨灰暂埋于黄泥坞，后才迁杭州南山公墓。

一代儒宗马一浮离开我们虽已30多（编者注：原作发表于2002年）个年头了，但他那渊博的学识、超人的智慧、绝世的天才，却像一颗明亮的星闪闪不灭。（本文选自《文史精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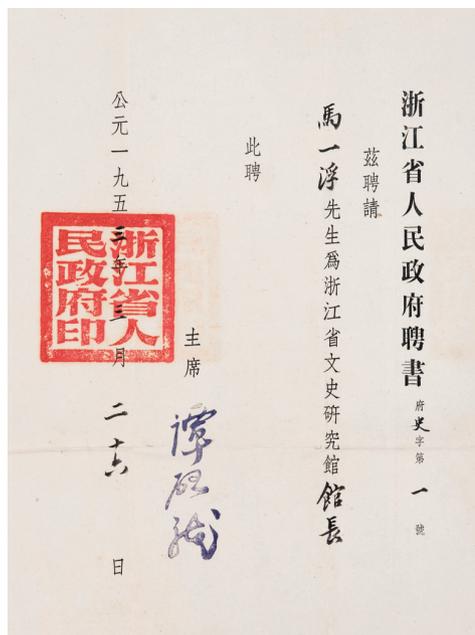
## 孤神独逸 博学硕望

### ——马一浮其人其书略论

文 / 崔 伟



马一浮(左)抵达宜山 浙大档案馆藏



1953年，浙江省人民政府聘请马一浮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马一浮（1883—1967年），浙江绍兴人，原名福田，后取《庄子·刻意》中“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之意，改名为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另号湛翁。晚年自署鬻戏老人（取《法华经》“鬻除戏论”义），名其居为“鬻戏斋”，别署鬻叟，曾先后用过被褐、太渊、宛委山人、服休、对湖野老、夕可老人等笔名和别号。

清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二十五日，马一浮生于四川成都，6岁时随亲出川返浙，寄寓杭州。其早年十分不幸，11岁丧母，19岁丧父，20岁丧妻，之后终身未再娶，无嗣。马一浮自幼聪颖过人，有神童之誉，16岁时参加绍兴县考，名列榜首。戊戌变法以后，为接

受新学，马一浮与谢无量一起去上海学习英文、法文和日文，并与谢无量、马君武共同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月刊，介绍西方文明及学说，时有“天下文章尽在马氏”之美誉。1903年，马一浮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牒，其间曾去柏林游历，习德文，带回一部德文版《资本论》，据说是国内最早的马克思著作。1904年，他又东渡至日本留学一年，学习日文与西班牙语。回国后，国事日非，民生益困，马一浮继续潜心读书，希望从中找到救国救民之理。1939年，马一浮应国民党教育部之请，在四川乐山参与筹创现代社会下的古典式书院——复性书院，专事讲学，任主讲。后因当局以政治干预书院

诸事，马一浮辞去讲席，专事刻书。解放后，马一浮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受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首任馆长，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等职。“文革”期间，马一浮受到冲击，1967年6月2日，因病与世长辞。

马一浮一生孤神独逸，不慕仕进，潜心学术，博学通会，在儒学、佛学、书法等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是20世纪令人仰止的一代宗师。在20世纪30、40年代，他与梁漱溟、熊十力被尊称为“儒学三家”，并列为三家之首。梁漱溟誉其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周恩来赞他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其治学经历先后经历了多次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余初始治考据，继专攻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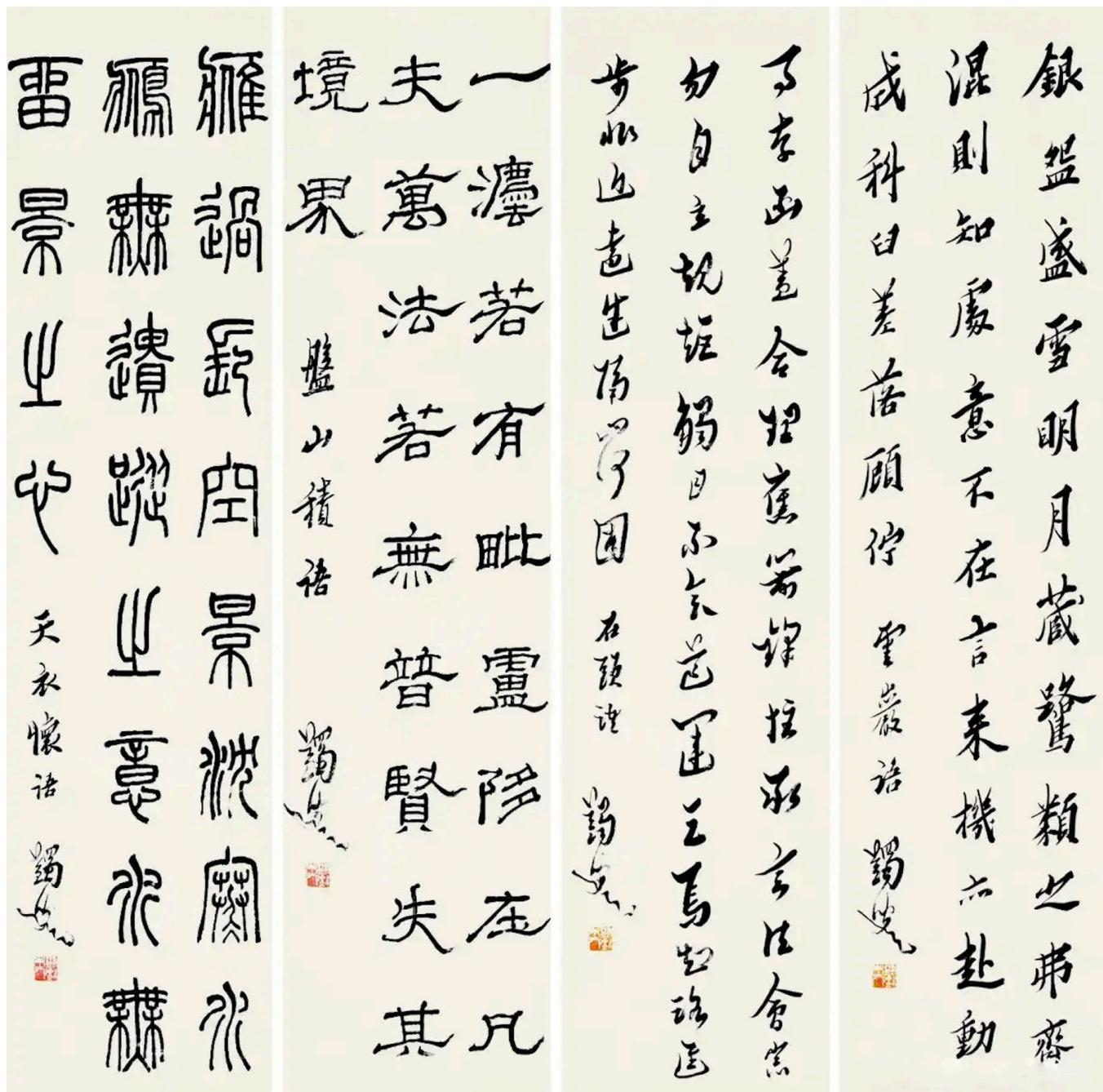


马一浮 篆书南岳马鸣  
联 对联 1963年  
书法内容：南岳青原分  
一脉，马鸣龙树是吾  
师。癸卯春，鬲戏老人  
书 时年八十有一。  
铃印：鬲戏老人（白）

学，用力既久，然后知其弊，又专治佛典，最后始归六经。”虽然马一浮在各个时期治学有所侧重，但并不在各家学说中分出主从，而是以会通各家学术为目的。他主张破除儒、道、佛以及儒、道、佛内部的种种门户之争。他认为，一些人之所以斤斤于派别门户之争，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过也”。

马一浮早年怀有积极的救世抱负，力图于西方文化之中发现救国之理，但是社会的黑暗和个人的生活经历使得他重新回到书斋之中，以另一种方式实践他的人生和社会理想。他说：“吉凶之道，贞胜者也。今言奋斗，但并此仁心以抗暴力，必可以济蹇难，乃所谓贞胜也。中土先哲具此信念最坚，故不忧不惧。”他认为现在中国只是一时为强力所困，因为势力是一时的、有尽的，而我国文化所追求的正义公理则是永久的。文化高于政治，文化之恒久意义高于一时一地势力之猖獗。文化乃出自人心，人心不应亡，则文化自有其所负之责，因为一国的根系所在便是此国的文化血脉。

在经历了中西之学的比较和对儒道释的深刻探求之后，马一浮最终回归儒学，倡导“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他认为天人一性、物我一体的中国传统智慧和追求，可以克服西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引导人类走入和谐、圆融、和平、有序的理想社会，真善美是人类生活的最终目的，并在理论上得出儒家六艺是世界人类一切文化之最后归宿的结论。他说：“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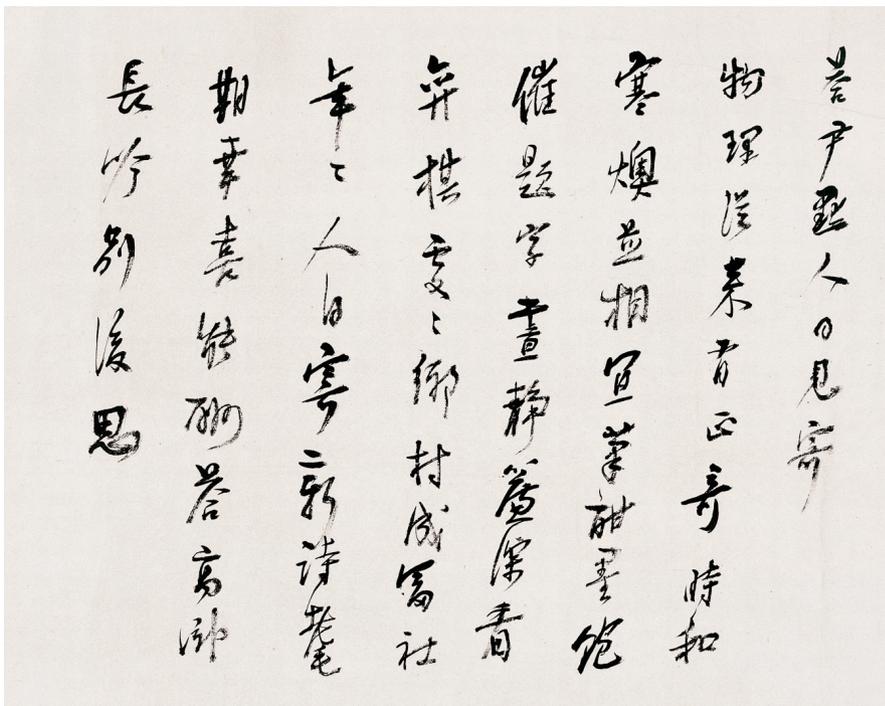
马一浮 正草隶篆四屏 32cm×132cm×4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藏

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举其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可统于《春秋》，因《易》明天道，凡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者皆属之；《春秋》明人事，凡研究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者皆属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

此最易知”。

马一浮在由西学转向儒学的过程中，一度走入佛学，于老庄玄学和佛学的各个流派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当其回归儒家六艺之后，佛学思想依然是其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资源。虽然马一浮没有出家，但他的佛学造诣早已超出一般的高僧，

三藏十二部无所不读，被认为是当世的维摩诘，人称“佛学大师”。著名的弘一法师之所以出家即是受到了马一浮的影响。马一浮曾记载两人的交往：“溯不佞与法师相识于沪上，在壬寅癸卯间，其后十余年未尝得见。直至民国初法师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始复相过从，迄于出家受具。此数年间，时



马一浮《答尹默人日见寄》

作品内容：物理从来有正奇，时和寒燠并相宜。笔酣墨饱催题字，昼静帘深看奕棋。处处乡村成富社，年年人日寄新诗。尧期惊喜能酬答，高卧长吟别后思。

接谈论。”广洽法师在纪念册“前言”中也提到：“弘一大师在俗时，虽年长马先生二岁，却经常登门求教，终于赖马先生之接引，悟道出家。”当马一浮得知李叔同受戒的消息后，亲自到灵隐寺看望他，并把明代藕益大师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清代见月律师的《宝华传戒正范》赠送给他。

马一浮博学硕望，常有名流前往拜访。时在杭州的黄宾虹、张宗祥、夏承焘、陆维钊、沙孟海等均为常客，远在外地的谢无量、沈尹默、丰子恺、高二适、林散之等也时来探望。1952年，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冒雨到蒋庄拜访了马一浮，引为知己。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来杭，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特地造访了马一浮，并在庭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马一浮不仅在学术上造诣非凡，为学界所推崇，其书法艺术也臻造妙境，素负盛名。早在20世纪30年代，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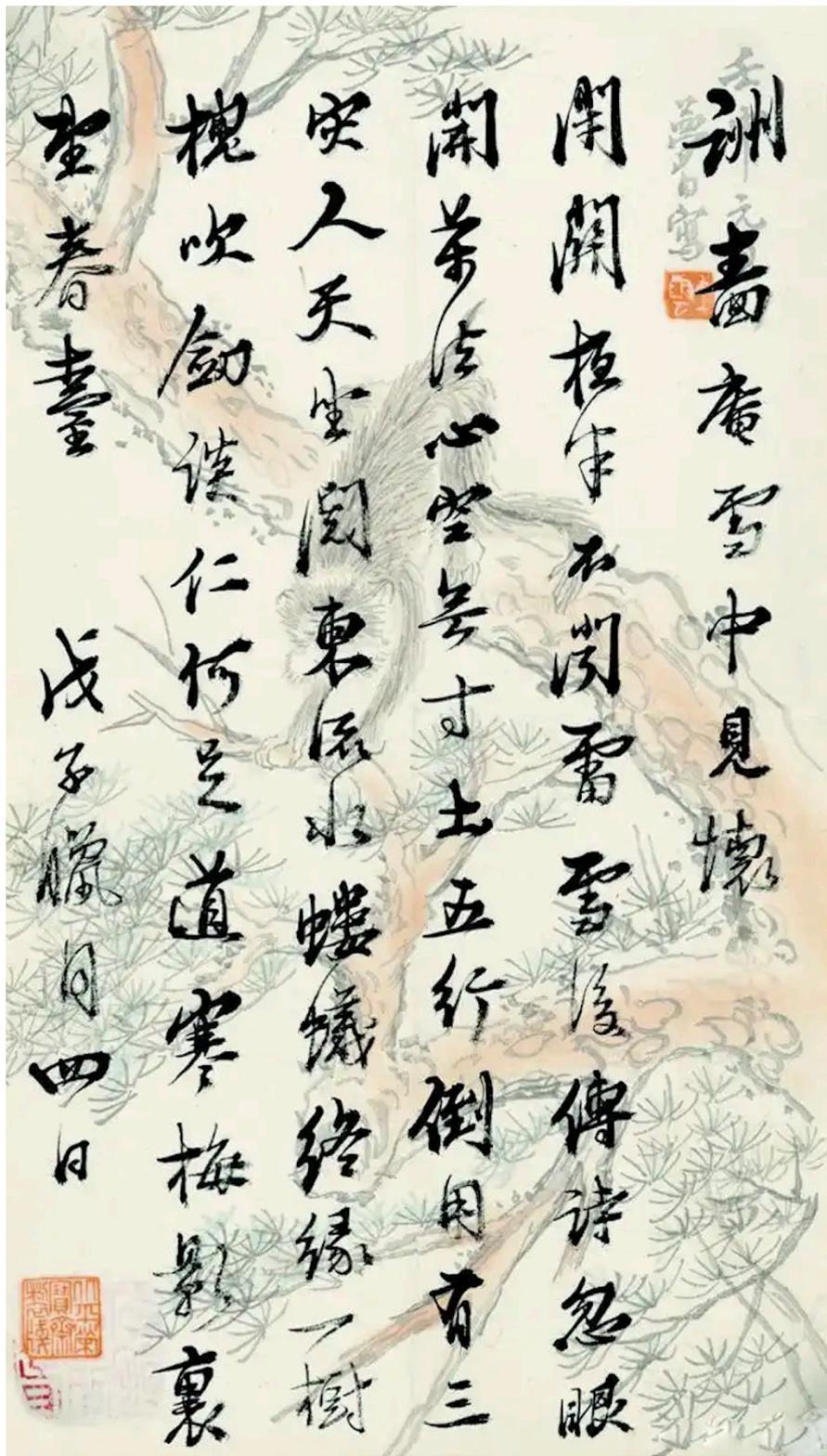
一浮书作就已蜚声书坛，丰子恺曾誉其为“中国书法界泰斗”。沙孟海在《论马一浮的书法艺术》一文中赞道：“我们展观马先生遗墨，再检读他《鬻戏斋题跋》，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代碑帖研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超卓，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虞毅夫亦在《马湛翁先生书法赞》一文中说：“古人每谓‘书如其人’，‘书为心画’，我证之以马公之书而益信。其才德学养之藏于中者，深湛玄远，莫测其底蕴；其英华之发于外者，尚赖笔札一耀其灵光。苟遇其人，则目击道存，必将有所感发，获益当不止于艺事而已。其书有不可及者四，孤征独到者一。童年而好之，老而乐之，终生不废临池，其精进不懈不可及；博习多优，兼擅诸体，独超众类，其多能不可及；结字坚紧，而气势旁达，酣畅尽致，其体用纯备，舒卷自如不可及；兴之所至，心手双忘，往往笔在意先，欲罢不能，其神

速不可及。至其书法之最大成就，尤在能到古人欲到未到之境。”

马一浮于金文、古籀、小篆、分隶、章草、真、行、小楷诸体兼善，而尤以行草和篆隶为最。其行书在取法上立足于《兰亭》《圣教》，又参之以章草、欧阳询父子、朱熹和沈寐叟之兴趣，最终形成一家之风格。在用笔上，虽多露锋、侧锋，然凝练精到、沉着痛快，了无薄弱尖锐之感。转折处翻转方折，以壮其骨力，使线条尤显爽利俊健。在用墨上，多以浓墨，然浓而不浊，枯而不燥，如干裂秋风，润含春雨，在行笔过程中，墨色的变化自然呈现出来，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在结体上，以险劲取势，左低右高，峭拔紧结，跌宕起伏，捺画取章草笔意，舒展飘逸，与中心的收敛形成对比，增强了字势的灵动。在章法上，拉开字距、行距，字字独立，少作连带，然气脉贯通，大有行云流水之妙，空灵清疏，意境深远。

马一浮于隶书也自视甚高，得仙逸之境。其在《隶势写本自跋》中说：“予既写《篆势》，因并写此篇。未换笔，故多存篆法，颇有蜿蜒缪戾之趣，非钱梅溪、邓完白所知也。”又在《〈杨淮表记〉临本跋》中说：“此刻仅后《杨孟文颂》廿五年，同在褒城石门西壁，字势相类，疑为一人所书；皆纯以篆势行之。钟元常所谓多骨丰筋者圣也。余少好临此，髦而不废，下笔乃为枯藤矣。”马一浮一生广临汉碑，尤好《石门颂》，从中悟得“香象渡河，羚羊挂角”之理，进而参以己意，着意夸张横画的蚕头燕尾，以取宽博舒展、纵横飞动之势，又于用墨枯中含润，神融恬淡，令人察之“惟观神采，不见字形”，真乃仙翁骑鹤，襟髯飘飘，古衲出尘，令人神往。

在篆书方面，马一浮也出手不俗。其在《书蔡中郎〈篆势〉写本后》中说：“不党索予篆书，久而未能应。今始为作此，自视犹在李少温、徐鼎臣之间。”柯文辉在《儒道仙风——马一浮大师的书法》中论曰：“马一浮篆书古雅雍和，起落笔如联语‘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停阑干欲暮时’等等微见锋颖，不尽藏锋，与李阳冰、钱坫不同，如修伟韵秀的古丈夫。”览其作品，使人如沐春风，望之惟逸，发之惟静，字里行间古雅纯正之气不觉沁人心脾，其线条因墨色的变化而天机毕现、入于化境，实非年高手硬、气敛神凝者所不能为。



马一浮 《酬青庵雪中见怀》诗稿 27cm×16cm 1948年 66岁作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藏



马一浮 行书 临河离群五言联  
135.5cm × 33.3cm × 2  
浙江图书馆藏

## 内蒙访古：草原文明的辉煌

文 / 赵德润

内蒙古草原之夏，绿草无边，鲜花满地。由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方宁带队，中央文史研究馆舒乙、杨天石、赵仁珪、白少帆、尼玛泽仁、吴静山、赵德润七位馆员到内蒙访古，就红山文化、蒙元文化和佛教文化研究保护等进行考察。考察团一行上红山，下辽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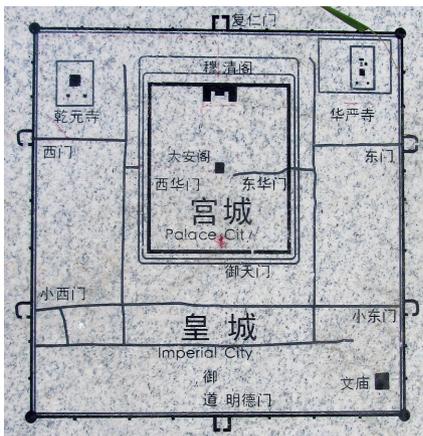
观名寺，穿过金莲川，走进元上都。直面历史遗迹，不免发思古之幽情；行程数千公里，仍有意犹未尽之感慨。

### 草原上的世界文化遗产

此次文化考察，适逢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元上都遗址，2012年6月29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第36届世界遗产

大会上，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2处世界遗产、第30处世界文化遗产。位于正蓝旗上都镇东20公里的元上都遗址，是750多年前元太祖忽必烈创建的具有文化融合典范价值的草原都城遗址，也是中国元代都城系列中创建最早、格局独特、保存完好的遗址。





元上都遗址平面图

走过千年生生不息的金莲川，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所书“元上都遗址”五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右侧是元太祖忽必烈和文臣武将们的巨型群雕。元上都和北京元大都的总设计师刘秉忠和都城水系设计师郭守敬在群雕中格外引人注目。

元上都始建于1256年，由宫城、皇城、外城等组成。城址平面呈方形，坐北朝南，边长2200米，面积近5平方公里。元上都经历百年辉煌，曾和北京元大都同时成为元代政治中心，是当时著名的夏都。1358年起毁于10年元末农民战争。废弃的遗址保存完整，宫城、皇城轮廓依稀可见，通过两道保存完好的城门似乎还能看到当年的风采。

元上都遗址作为规模最大的草原都城遗址，在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元朝共有6位帝王在上都登基。元中期以后发生的“南坡之变”“两都之战”“上都兵变”等宫廷斗争、流血冲突也都发生在元上都。元上都以其地处中原农区与北方牧区交接地带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游牧民族从军事征战转向王朝治理的过程中，见证了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作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的精髓结合于一城的杰出范例，在世界文明史和城市规划设计史上拥有独特的地位。



元上都遗址



元上都遗址宫门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长安泳锡说起内蒙古文物保护和元上都申遗，如数家珍。他说2011年初我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报元上都遗址，当年8月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到元上都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评估，考察报告对元上都遗址给予高度评价。经过国际专家实地考察评估和当年9月对元上都遗址“9个询问”，以及2012年4月“7个询问”的“考试”，元上都遗址顺利通过评审，列入世界遗产行列。考察途中，安泳锡提出如何看待蒙元时期文化艺术的发展，他和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石玉平信手拈来的典故注解，引起各位馆员极大兴趣。

蒙元时期不仅疆域广大，国力强盛，而且艺术繁荣，名家辈出。元曲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朵奇葩，艺术成就独具特色，堪称与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里程碑。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位元代杂剧作家，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被称为“元曲四大家”。书画艺术更是宗唐宗晋，各有其妙。绘画有代表元代山水画的主流的“元四家”。关于“元四家”，一说是指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人，（见明代董其昌《容台集·画旨》）。一说是指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四人，（见明代王世贞《艺苑

卮言·附录》)。其画风各有特点,崇尚传统,重笔墨,尚意趣,对明清两代和后世影响很大。元代书法继承晋唐,崇尚复古。赵孟頫、康里巎巎、鲜于枢、耶律楚材等是这一时期书家的代表。他们主张书画同法,注重结字的体态,以真、行、草书为书法主流。由此可见,蒙元时期的文化艺术上承唐宋,下启明清,也是中华文化艺术一个高峰。

### 红山文化体现多元文明

蒙冀辽三省区交汇处的赤峰市,因境内一座赭红色山峰而得名。红山海拔仅746米,方圆不过10平方公里,但它所代表的中国古代北方历史文化,可以上溯到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山遗址群,包括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战国时期文化和契丹辽文化。红山文化的分布,其北界越过西拉木伦河,并有继续向内蒙古草原深入的趋势;东界越过医巫闾山,到达下辽河西岸;南界东段可达渤海沿岸,西段越燕山山脉到达华北平原;西界目前可确定在河北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从现有地域行政区划来看,内蒙古赤峰和辽宁朝阳两市区域内最为集中。内蒙古境内以聚落文化为主要特征的遗址和辽宁省境内以祭祀文化为主要特征的遗址,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红山文化遗址。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辽上京遗址和元上都遗址充分证明,北方草原文明是中华文明直接而重要的源头之一。1993年8月,第一届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市举行。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严文明教授发表了著名的“三系统”说,即中国古代文化有三个系统居于主要地位。一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北系统;二是以长江中下游为主体的东南系统;三是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东北系



红山文化遗址



元代花押印



元代金面具

统。史学界专家认为,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辽河源头地区红山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源头。“三系统”说、“三流域”说都强调中华文明的多元一统。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等遗存,代表了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红山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已经创造出各种形状奇特的玉器。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出土的C形玉龙,高26厘米,由绿色岫岩玉圆雕而成,龙的吻部前伸,略略上翘,嘴紧闭,鼻端截平,有对称的双圆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形。龙体卷曲呈“C”形,龙的颈部长鬣上扬,刚劲有力,显现腾云驾雾的动感,这件墨绿玉

龙被史学界称为中华第一龙,距今6000年至5500年。而内蒙敖汉旗境内首次出现由猪首、鹿首和神鸟组合的“灵物图像”,考古界称之为文化代表物为“中国第一神图和最早的透视画”,在意识形态和绘画艺术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方宁主持的红山聚落文化遗址与元上都遗址保护研究座谈会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同自治区文物局、赤峰和锡林郭勒盟两地负责人先后发言,就文物保护与研究进行深入讨论。学界一致认为,从红山文化到草原青铜文化,从契丹辽文化到蒙元文化,形成了灿烂辉煌的草原文化;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推动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草原文明的历史遗存和文物的保护与研究意义重大,任重道远。



考察团一行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山遗址群考察



中华碧玉龙



辽上京宫殿柱础

辽上京遗址是我国保存最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是辽圣宗以前的统治中心。辽代共建有五京，其中上京城是营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都城，是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我国古代漠北地区的第一座都城。上京作为辽都长达204年之久，先后有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等9位帝王在此登基。太祖陵是耶律阿保机的陵墓，辽祖州城是守护和祭祀辽太祖陵墓的奉陵邑，是研究契丹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在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我们欣赏了辽墓壁画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壁画艺术占有重要的一页，有着重要的艺术与历史价值。辽墓壁画的表现手法以线条为主，上彩绘制而成。画中人物生动传神，是辽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其对了解我国古代历史、文化有很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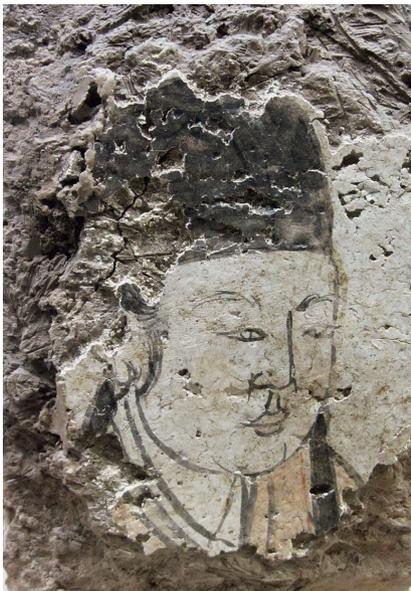
### 一代名寺见证民族团结历史佳话

1961年初秋，老舍先生到内蒙考察，在红山脚下流连忘返，赋诗一首：“塞上红山映碧池，茅亭望断柳丝丝。

临风莫问秋消息，雁不思归花落迟。”如今，舒乙先生挥笔写下了父亲半个世纪前的诗作，表达了热爱祖国河山讴歌民族团结的赤子之情。

我国北方草原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风格，蕴含着现代文明赖以传承的优秀文化遗产、精神资源和思想源泉，对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推动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舒乙先生等还专程走访了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这里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代名寺汇宗寺、善因寺见证了清王朝固土封疆的雄才大略和各民族团结和谐的历史。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西准格尔部首领葛尔丹率兵入侵漠北喀尔喀地区，迫使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部众南移避难。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37岁的康熙皇帝亲帅大军在乌兰布通大胜葛尔丹。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亲自召集漠南蒙古48旗扎沙克漠北36旗扎沙克，于多伦诺尔会盟。从此，漠北喀尔喀三部正式并入清帝国版图，蒙古成为清帝国在北



前进村辽墓壁画



前进村辽墓壁画

部疆域不设防的屏障。

多伦会盟期间，蒙古王公要求“建寺以彰盛典”。康熙尊重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的习俗，敕令在多伦会盟处兴建故宫中和殿风格、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的汇宗寺。康熙多次到汇宗寺礼佛，题寺名、赐匾额、题写御制碑文。清廷“令蒙古各部落居一僧以住持”。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又敕令在汇宗寺西南新建宏伟壮丽的善因寺和行宫，雍正赐匾额题碑文，延请高僧大德二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主持善因寺宗教事务，协助清政府处理蒙藏事务，维护和巩固了清廷对蒙古社会的统治。每年春夏之际，两大寺院都会举行盛大庙会。多伦诺尔成为商号林立、贸易发达的重要商阜。

“西僧迎辇列香幡，击鼓吹螺动法门。番界从来知佛大，而今更识帝王尊。”清代诗人查慎行几次随康熙到访汇宗寺。他的这首诗，深刻道出了康熙的深谋远虑和一代名寺的政治使命。

考察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应内蒙古文史研究馆馆长张建华之邀，访问了位于呼和浩特北郊的全国文史书画研究

北方基地。短短三年时间，一座三千多平米的砖红色文化小楼在大青山脚下悄然竖起，一大批精品书画和文史资料陈列其中，其功能集研究、创作、陈列、展览于一体，立足内蒙古，面向北方省区市组织区域性书画活动的理念也开始体现，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史书画研究基地。各位馆员分别应邀题字、赋诗、作画，我也赋诗一首《内蒙访古》：

内蒙访古七月间，草原圣地是红山。  
玉龙灵动传千古，多元文明新史观。  
辽京元都一时盛，中华文脉代代传。  
北国兴替多少事，鲜花依旧金莲川。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写于2012年7月）